

# 推动文艺出版从“高原”向“高峰”跨越

## 降低文学创作收入税负

■邱华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



自2018年个税改革以来,很多作家持续反映,新的个税法虽然提高了综合个税起征点,但未充分考虑文学创作规律和作家收入现状,一些作家的税收负担并没有减轻。作家们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一是未充分考虑作家创作特殊性和收入波动性。从劳动周期来看,文学创作是一种特殊劳动,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尤其是经典与严肃文学作品的创作,从酝酿构思、素材收集、文本书写、修改润色、定稿交稿、出版印刷,到最终获得稿酬通常无法在一年内完成,往往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如果考虑到通过授权改编获得经济收入,可能需要更长时间。如《平凡的世界》创作用时6年,29年后改编的电视剧才上映。就大多数作家而言,一部作品能够销售火爆,或得到高额的改编授权费用,在整个创作生涯中可能只有一两次,但无论是稿酬还是作品特许权使用费,都需要按次预缴个税,并在单一年度进行汇算清缴,有违文学创作的周期规律。

## 加强翻译人才队伍建设

■韩敬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翻译是文化交流、文明互鉴的津梁,翻译家是文化交流互鉴的使者,也可以说是文明的播火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翻译对中国的思想启蒙、文化新变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林纾、鲁迅、茅盾、巴金等文学大家同时也是翻译大家。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翻译和翻译家的贡献。

目前翻译家队伍的梯队建设及生存现状堪忧。翻译稿酬不高,翻译成果在相关学术成果评价体系中得不到承认,翻译家的尊严与荣誉感缺失,各种因素叠加使得今天愿意从事翻译工作的外语人才越来越少,一流外语人才愿意做翻译的堪称凤毛麟角,一些还愿意从事翻译的有志之士更多的是出于情怀、兴趣。长此以往,中国翻译队伍有可能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图书的翻译质量也不乐观。去年底、今年初,王智量、柳鸣九、郭宏安、李文俊、杨苡等一批翻译大家相继去世,人们在追忆大师的同时,不免产生对翻译界现状的忧虑。

为解决目前翻译人才队伍存在情况,我建议:

一是重视和提升目前的学术评价或考核体系中文学或学术翻译成果的价值和地位。在目前各高校的文职称评价体系中将翻译成果只是作为可有可无的点缀进入科研考评体系。这导致大量外国文学研究人才专注于撰写论文,申请社科课题或人才称号。享有丰富学术资源、外语功底扎实的资深学者很少愿意从事高强度、低回报的翻译活动。目前文学或学术翻译人才队伍以体制内的青年学者和体制外的自由译者为主。体制内的青年学者通过多年历练,往往刚成长为出色译者,就会面临竞逐高级职称的难题,常因迫于压力而放弃文学翻译工作。所以,在目前的翻译队伍里,很难见到那批活跃于学界,最有创造力、才华、学识、思想的资深学者的身影。国内翻译业界整体水平不高,优秀



## 推进文艺出版高质量发展

■汪惠仁(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高质量发展”已扩展成为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我们应认真地、诚意地、客观地看待出版现状,争取更大的创造与新生。我从从事文艺出版近30年,下面我以文艺出版为例,就如何推进出版高质量发展,谈几点建议。

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我们的文艺出版取得了非凡的业绩,从产业的总规模,从产品的丰富性,从单一的纸质出版到现代融合出版,从单一书店售卖到现代多媒体传播,中国的文艺出版呼应着时代的步伐与文艺创作的脉动,在各个方面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艺出版更是获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在主题出版、当代优秀文艺图书对外输出、助力全民阅读等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

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当前的文艺出版距离“高质量发展”这样的总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面向现代文艺出版的公平市场秩序尚未真正建立;二是文艺出版的核心内容供给的原创性、独创性、活力性有待提高;三是文艺出版“走出去”的有效性不够;四是全民阅读特别是文艺阅读深入开展缺乏细致设计。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会严重制约文艺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公平市场秩序的缺失,制约着企业化运营的文艺出版的健康行业生态的生成;原创性、独创性、活力性的核心内容供给的缺失,制约着文艺出版着力点由“高原”到“高峰”的转移;流于形式、未在

二是未区分作家身份,没有考虑创作成本与“亏损”。以写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作家,其写作事业与个体经营有很大相似性,在写作过程可能需要自行承担多项支出成本,如采访、差旅、资料、设备费用,在单个税收年度中,写作收入也许不能够完全弥补支出,有的作家甚至几年都没有创作收入,实质处于“亏损”状态。我国税法规定,个体经营发生的亏损可以向以后年度结转,而作家的稿费收入和授权许可费用,并不会考虑此前几年的长期成本与“亏损”。

针对上述情况,我建议:

一是充分考虑作家创作规律和收入特点,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将稿酬和作品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平均到几个年度计算纳税,如英国规定作家可以在连续2年平均计算利润纳税,澳大利亚规定作家为“特殊专业人士”,其收入纳税可以在5年内平均。

二是区分作家身份,对完全或主要以创作为收入来源的作家,规定一定比例或固定金额,在纳税时允许从其收入中扣除(如设备、交通等成本费用),如爱尔兰规定作家销售其原创作品获得的第一个5万欧元所得给予免税待遇,通过税收减免政策,降低作家创作成本,提高作家创作积极性。



翻译人才不断流失,都与此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高水平的文学或学术翻译是一项具有很高创造性和专业性的创作或研究活动。这些翻译成果是连通学界与大众的桥梁,对学术理论视野的拓展、学术方法的创新、本国文学创作的提升、文化观念的丰富、民众审美情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有必要改变翻译在学术评价体系中的边缘化地位,提升优质翻译成果在职称考核体系中的分量。解决这个问题一个突破口是在国内人文社科三大核心期刊体系(南大、北大、中国社科院)中专设译文类子目录,将致力于外国文学译介的期刊,如《世界文学》,纳入其中。《世界文学》等译文类期刊专注于捕捉外国文学动向,译介当代外国文学精品,以满足国家的精神建设需要和国内普通民众的文学需求,编辑队伍由精通中外语、具备研究能力的人才组成,杂志质量为翻译出版界翘楚。将这类杂志纳入核心期刊评价体系内,有助于吸引更多高校或科研机构的人才投身翻译活动,对出版界提升翻译水准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二是适度提高翻译稿酬,鼓励出版界与翻译界形成双赢的局面。在社科院外文所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上个世纪50年代,叶水夫先生一部译著拿了9000元稿费,加上1000元,在王府井这样的黄金地段买了一座四合院。今天的翻译家不会奢望这样的待遇,但翻译稿酬偏低也是实在的问题。比如有的出版社就明确规定只要是译著决不签版税。目前的翻译稿酬很多采用千字稿酬方式,出版社调整有一定空间,建议对一流译者的优秀译作标准从优。对一些印量很大的图书,出版社在保证盈利的基础上,也可以酌情考虑以版税的方式适度回馈译者。

为此,我建议:

一是加速推进现代化中国文艺出版公平秩序市场制度的顶层设计。主要包括文艺书刊定价制度、新旧出版物的时限界定及其标准零售折扣的行业约定等;建议主管部门对行业协会的管理职能进一步赋权,让行业协会尽快成长为维护文艺出版良好市场生态的中坚力量;尊重国内统一大市场原则,建议中央主管部门对地方文艺书刊出版的财政补贴水平作出合理化提示。

二是在坚持正确出版导向的前提下,培育文艺出版的多元化与活跃性。在新的时代,文艺创作与文艺出版,都面临着由“高原”到“高峰”的艰辛攀登与跃进,而文艺出版的多元化与活跃性,有效地保存了时代精神、生活的丰富性与生机,切实尊重文艺出版机构的市场主体地位,切实尊重个性化美学追求,切实呵护为“高峰”之作诞生提供充满创造性的文化环境。

三是探索合适交流方式,实现文艺真实输出。中国文艺出版“走出去”,不能搞强行输出,更不能搞赔本的面子工程。文艺是关乎心灵的事,关乎心性的事,语纵不通心可通,我们要本着这样彼此走近的善意来拥抱世界,来实现中国文艺“走出去”。

四是设计合理文艺出版子课题,助力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全民阅读的深入扎实推进,需要从数量、面积型公共服务转轨到质量、深度型公共服务,这就要求我们设计关于文艺阅读的子课题子主题,让读书与国民素养发生真实有效的链接。

## 履职风采

### 朱旗:图书价格立法关乎出版社和实体书店生存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田红媛



【委员简介】朱旗,男,上海朵云轩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规范网上网下出版秩序”,具体为“加强出版物价格监督管理,推动图书价格立法,有效制止网上网下出版物销售恶性‘价格战’,营造健康有序的市场环境”。朱旗表示,这些内容给了出版从业者很大鼓舞,呼吁有关部门加快进程,推动出版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作为朵云轩集团总经理,朱旗为什么如此关注图书价格问题?聊到从业经历,他说自己人生的前半段都和出版相关,在上海教育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图书公司、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等单位的工作,尤其是8年的图书零售经历,让他切身体会到发行环节的痛点难点。“这个问题困扰了我们很多年。30年前,图书发行进入完全竞争的市场环境,初衷是好的,希望能让发行环节变得更加高效有序,但后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应用,电商平台话语权越来越高,尤其是疫情期间新渠道快速发展,出版社慢慢丧失主导权,实体书店被边缘化,纷纷转型另谋出路。这对整个行业来说,是很危险的。”

打折是图书电商、新渠道平台的主要引流手段。在价格乱象下,出版社、实体书店、读者,没有一个是受益者。据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图书平均定价同比上涨达14%,新书销售码洋同比下降45%,出版内容创新驱动不足。

朱旗说道:“提高图书定价是出版社的自救行为,是为了保证最起码的利润空间。另外,由于图书发行环节长期沿用‘寄销制、抽单结算’等粗放管理模式,导致无法做到单品管理,实销实结。出版社无法及时了解产品的真实销售状况,存在货款被长期占用的风险。反过来,为了加快资金回笼,内容生产上可能就会迎合平台需求。这是一种恶性循环,文化市场和一般消费品市场不一样,‘曲高和寡’的逆淘汰现象就是典型的文化市场失灵的表现。”

为此,朱旗建议,尽快研发、推行统一的图书发行“进、销、存”系统,实现单品图书实销实

### 郭媛媛:强化“带根履职”意识,推动文化发展繁荣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田红媛



【委员简介】郭媛媛,女,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新闻传播学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十三届、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北京市丰台区政协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北京市丰台区政协常委。获评北京市优秀教师;两获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入选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积极分子;获2022年度全国政协优秀委员履职奖提名奖表彰;连续8年获评北京市丰台区政协委员、优秀提案委员、优秀信息委员。

由于学科背景和工作经历的原因,郭媛媛关心的话题面很广,涉及文体、经济、生态等各方面。在担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的5年中,她真心真情投入,每年都随全国政协进行调研,总共提交了20多份提案,与大文化领域相关的内容很多,涵盖主流文化建设、融媒体建设、媒介资源整合等细分板块。连任后她要求自己“带根履职”,为民族文化、为人民利益、为国家发展、为社会进步建言献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文明建设,把网络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网络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引领和推动网络文明建设上取得显著成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为符合新征程上的大国发展要求,文化传媒行业面临如何更好、更健康、更完善的问题。基于自身所做的媒体传播研究,郭媛媛对新媒体内容建设一直比较关注。她表示,这5~10年来,国家在紧锣密鼓地推进新媒体内容建设的相关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很多问题都得到较好的应对和解决。本届履职中,她还会继续关注这一领域,而且会更深入地调查研究,做好提案。

谈到过去5年履职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郭媛媛脱口而出——政协读书。2020年4月23日,十三届全国政协启动了委员读书活动。该活动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读书学习的重要论述为指导,认真落实全国政协党组和汪洋主席的部署,委员参与面不断扩大、活动方式不断丰富、地方政协不断跟进,成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工作的重要品牌。郭媛媛说道:“全国政协委员读书活动是一场高标准、高规格的政治文化实践活动,非常有利于委员们履职本领的提升。这届我还在新闻出版界别,我们这个界别大家共同关注的话题就是读书。读书能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增强民族自信心。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多年把全民

结,出版社可以根据图书真实的市场表现及时调整选题方向、印数决策、渠道策略和营销方案,提高出版效率;同时也能有效制约个别经销商利用不同渠道的巨大进货差价恶意串货套现,防止平台利用信息不对称有意延长账期,占用出版社资金。建立起一套公开、透明、诚信、高效的图书发行运营机制,助力图书价格立法尽快落地见效。

图书价格立法也是对渠道公平销售权利的保障。由于进货成本、运营成本的差异,尤其是疫情后读者消费习惯快速向线上转移,实体书店的生存问题引起业内的广泛关注。

朱旗表示,相信只要打破平台垄断,实体书店自己是能够找到生存办法的。“我们在建设文化强国,一个文化大都市如果没有书店的话,是难以想象的。业态的多样性非常重要,对一些经营特色明显、读者口碑很好的实体书店,可以制订可持续的扶持计划。”

他还提到,当下读者被眼前的现象迷惑,对出版社有很大的误解,感觉幸亏有很多平台低价竞争,才能买到便宜的书。读者并不清楚,如果不是因为平台打折、低价竞争,书不会这么贵。推动图书价格立法落地,才能让大家都受益。同时,他也呼吁头部出版集团、出版社加强沟通,对行业的重要问题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引领全民阅读,让阅读成为刚需。

“图书价格立法是整治图书市场乱象的重要抓手,能有效防止垄断的出现,保证文化安全。”朱旗说:“但这个规则和限制是双向的,也要充分调研听取多方意见,对出版社提出要求,确保图书定价的合理性、规范性。”

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期间,朱旗关心的更多是民生问题。这次履职全国政协委员,他要求自己尽快转变角色,通过不断学习,提升履职能力。他肩负着双重使命,同时为出版和艺术行业发声,所以也带来了减免回流文物艺术品进口(境)税收、重视艺术品产业人才培养的相关建议。

“不管是代表还是委员,履职为民都是唯一目的。我觉得还是要坚持不调研就不提案,要让提案更有质量、更有针对性。”朱旗说,这次进京前,他专门调研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兄弟单位,发现发行环节的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更严重。所以想和业界一起,推动“老大难”问题的解决,今年不行就明年再提,明年不行就后年再提,希望发声的人能再多一点。

阅读写入其中,体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郭媛媛重点关注网络生态建设,虚拟经济时代职业身份划分、未成年人保护、游戏产业健康发展正面应用,以及社区基层人员素质能力建设等问题。她表示,上一届履职期间,自己的提案中的意见、建议有数稿被采纳、批示。这届将强化“带根履职”的意识。“带根履职”的概念是郭媛媛参与各种活动后切身体会到的,也是她在这一届特别想加强的。据她介绍,“带根”主要有四个层次。一是民族文化之根,要传承5000年文明,增强文化自信。二是人民利益之根,要深入一线调研,一切为了人民。三是国家发展之根,站在国家发展大局,思考面对的现实问题。四是社会进步之根,要有人类命运共同体格局。只有这样带着深根履职,才能找到定力、更加稳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伴随国内外防疫政策调整,文化交流活动逐步恢复,这阶段我国文化走出去要抢抓哪些机遇?郭媛媛认为,以“融”“质”“新”“共”为特质,国内外文化发展从“非常”复归正常,有着阶段性“时”与“空”的特别机遇,具体来讲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文化市场机遇,面对文化产品的急需,做好“物”的文章。二是文化交往机遇,加快推进合作的节奏,做好“关系”的文章。三是文化合作机遇,基于融合共赢的追求,做好“利益”的文章。四是文化补白机遇,占据前沿发展,做好“技术与研发”的文章。

同时她还提到,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为立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要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要自觉、务实、渐进、稳健,以民族文化特色体现的“特性”为优,以人类共同观念表达的“共性”为媒,以文化表达形态嵌套、新媒体技术赋能应用的“融合”为形,以文化传播面貌呈现的“自信”为基,扎实推进中国特色传播设施、话语、内容等体系、形态建设。